

內藤湖南和中國史學界的互動及其影響——劉正教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394

第三十三卷 第十期 | 三月號 |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出版，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創刊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跨越三十年 · 中文學人的共同資產

榮獲2016年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評選

國文 天地

發揚中華文化 · 普及文史知識 · 輔助國文教學

香港學海書樓專輯

楊永漢 學海書樓的創建
區志堅 國學南移——學海書樓九十五年（1923-2018）
彭淑敏 香港華商與學海書樓
賴志成 簡述學海書樓創辦人賴際熙對近代學術的貢獻
曾漢棠 陳伯陶《孝經說》思想三題
區建英 區大典——一個寓港經學家的信念與奮鬥
許振興 俞叔文與學海書樓
葉德平 學貫五經，宏振斯文——陳澧先生事略

天地書肆

李昇 《經世與安身：中國近世思想史論衡》寫法述評
蔡淵迪 孰謂「經學」，何以「敦煌」——許建平教授新著《敦煌經學文獻論稿》簡介

學林人物

楊焯 望海樓學記——王遜熙先生的治學格局、研究
區志堅 謹識



ISSN 1011-0974
A 171287054777





萬卷樓

國文天地雜誌

萬卷樓圖書

回首頁

禹卷大陸書

禹卷樓出版品

台灣圖書

國文天地

中國文字

關於禹卷樓

會員登入

帳號

密碼



[忘記密碼](#)

[加入會員](#)

國文天地搜尋引擎

作者

篇名

期數

[查詢](#)



國文天地雜誌 - 第418期

出版日期：2020年03月

本期特輯分享給愛好詩歌創作的同好，與熱愛馬偕紀念園區的諸多醫學教育文史與紀念建物...



篇名	作者	頁次
百家筆談		
〈陳確《葬書》之研究〉出版後記——緬懷何師佑森教授	孫廣海	4
滄浪正道卜爻居——《段祺瑞正道居詩文註釋》後記	陳煒舜	8
思想文化		
星雲大師與回文修辭佳句	何永清	81
中時「精神之德」的限域之探	許維權	95
內藤湖南和中國史學界的互動及其影響——劉正教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劉正	91
卜官在動物世界(五) 內藤之說	潘銘基	100
現代文學		
兩個自我之間的搏奕——解讀王定國《敵人的櫻花》	黃雅莉	107
為巴金辯護的日本學者——阪井洋史	盧茂君	115
國文教學		
經典文選(十) 遊走於鬼唱詩與人間語——《聊齋志異·勞山道士》	楊曉菁	121
天地書肆		
《碩堂輯佚札叢》自序	何廣棧	128

內藤湖南和中國史學界的 互動及其影響

——劉正教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劉 正

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

作者按：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筆者受邀在哈佛大學舉行有關日本漢學京都學派的專題學術演講，特地撰寫此文。本文通過對內藤湖南從小學教師走向記者、再轉而為大學教授的生平經歷，給予總結。通過具體事實，揭示了內藤史學和中國歷史學界的互動及其對後者在上古史、隋唐史和清史研究的巨大影響。（此文文稿有中、日、英三種版本）

很高興能來哈佛大學和大家交流。今天，漢語依然是我的書寫語言，而日語則是我最近幾十年的學術閱讀語言。在不遠的日子裡，英語不只是我的生活語言，我希望它還可以成為我的工作語言。

我今天想向大家彙報的題目是「內藤湖南和中國史學界的互動及其影響」。

雖然我在日本留學和工作十幾年，但是因為我的碩士時代的專業是《周易》和中國哲學研究、博士時代的專業是日本漢學和東西漢學發展史的研究、博士後的專業是商周金文研究。因此，對於京都學派、對於內藤湖南，我的研究還非常膚淺。我在二〇〇

七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十八萬字的《京都學派》一書，這是對京都學派開創時期的漢學研究的總結。又在二〇〇九年，由學苑出版社出版了三十萬字的《京都學派漢學史稿》一書，這是對京都學派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學者們漢學研究的介紹和總結。去年，我又撰寫了五十幾萬字的《日本京都學派漢學研究史》，這是對京都學派誕生至今整整一百一十年漢學研究歷史的總結。這部新作預計在明年春節前後精裝出版。



劉正在哈佛留影

如果將來有可能的話，我還想撰寫三卷本、一百萬字篇幅、有各個漢學家照片的《京都學派漢學通史》。

因此，結合今天這個題目，大家都知道內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學派的創始人。如果我們認真的討論他，我是指：假如我們有機會每週討論一次，每次一小時的話，我相信至少我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可以對內藤湖南和整個京都學派有個大致的瞭解。比如，我個人其實很喜歡研究的漢學家，並不是內藤湖南，而是桑原鷺藏。京都學派有兩個創始人，一個是內藤湖南，另一個就是桑原鷺藏。實際上，京都學派真正取得世界性聲譽和在學術界站住腳，是桑原先生的功勞！只是，內藤先生是京都學派的最大代表，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他更喜歡社交活動、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而真正在大學的講壇上，為京都學派的誕生作出巨大貢獻的，卻是桑原先生。我個人傾向於認定內藤是思想家，而桑原是考證學派的歷史學者。

好了，我開始向大家彙報我對內藤的一點認識。

一 內藤湖南生平介紹

內藤湖南生於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秋田縣人。屬虎，行二，故本名為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是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又稱京都支那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為什麼號湖南呢？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毛馬內町的北面有個小湖泊，名叫景勝十和田湖。而湖的南面就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字號湖南的意思，就是景勝十和田湖南面出生之人。

內藤湖南五歲時，就開始讀《四書》，九歲時，已經能寫淺顯的漢詩，十三歲時，開始通讀《日本外史》。初中畢業後，他考上秋田師範學校四年制高中部師範科學習。在此四年間，他系統學習了中國儒家經典和日本古代文史名著，這期間看得最多的是《全唐詩》和《唐詩別裁集》等書。從這裡畢業後，二十歲的他成了小學的教師。正是在這裡，他開始接觸到了佛教。一八八七年，辭去小學的工作，來到東京，在一家佛教宣傳雜誌社《明教新誌》開始當記者。以後，又先後在《東京電報》、《日本人》等幾家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的報社當記者。因為經常發表有關日俄戰爭的政論性評論而使他名聲大振。於是，他視野逐漸轉到了對日本有重大利益關係的大清和俄羅斯大帝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上。一八九三年，內藤湖南來到大阪，成為大阪《朝日新聞》的政論記者，開始了他從關東（東京）走向關西（京都）的重要的一步。

（一）記者時代的內藤

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間爆發的甲午戰爭，為內藤湖南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集中精力，關注晚清時代的中國，提供了契機。

一八九七年，內藤湖南最早的有關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專著《諸葛武侯》一書正式出版。這是內藤湖南發表的第一部漢學著作。在大阪的十幾年記者生涯中，他去過臺灣，到過中國東北……他的日本文化觀和歷史觀、中國文化觀等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思想，都是在這一階段中產生和逐漸定型的。這使他的影響已經遠遠地超出了新聞界。可

以說，內藤史學從一開始形成的過程中，就帶有十分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質。

根據內藤湖南年譜的記載，他一生先後十次造訪中國。他先後結識了老一代中國朝野碩學之士，也同時和當時正值年輕的學者保持來往，使他的中國朋友遍及晚清、滿洲和民國時代的學界名流和政界要員。

一八九九年九月至十一月，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國土，從北京一直看到南京，他回國後寫成《燕山楚水》一書，結集出版。這一次應當說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分，開始了中國之旅，為他日後走上專業的漢學研究，打下了基礎。在他的《燕山楚水》一書中，記載他曾親自到過我的家鄉北京市昌平縣南口鎮住了一夜，並對「當地旅舍居然有水沖廁所」，表示「驚訝」。對比一下他說當時的「北京城簡直就像個大廁所」，臭氣薰天，我的家鄉居然當時如此先進，讓我感到快意。

（二）文化間諜時代的內藤

一九〇五年七月，他受日本外務省委託，帶著軍事目的的調查活動，開始了對東北的滿洲文獻和江浙的藏書樓的調查。也正是從這次開始，他多次實地考察訪求罕見圖書寫本和善本，大規模的，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收集和盜取中國古代文獻活動，正式走上前臺：《滿文老檔》、《蒙古源流》、《清文鑑》、《滿蒙文大藏經》、《盛京全圖》，乃至於著名的《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珍貴文獻，包括剛剛運到北京的大批敦煌文獻，或被照相，或被複製，或為收購，從此正式流入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本來就具有

深湛的漢學造詣，當他開始掌握了滿語和蒙語之後，自由地使用滿、蒙史料，使他的學術研究視野異常開闊，他當時就已經被一致公認是第一流的、備受關注和敬畏的日本東洋史大家而蜚聲世界。

一九〇六年，內藤湖南再次來到東北。他在事先查閱了《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等古籍的基礎上，寫出了詳細的調查報告。該報告中，對東北地區保存的唐代的「鴻臚井刻石碑」的歷史價值，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為該刻石具有「匡正《大明一統志》及《大清一統志》的疏謬」的學術價值，而且「與渤海國有關」，進而可以考證日本古代史。他建議日本軍部「要特別關注」，最終該刻石被日本軍部派人秘密盜往日本。這件珍貴的唐代文物，正是由於內藤的考察和報告，最後被日軍在一九〇八年盜走，並保存在日本皇宮。這是他在文化間諜工作時期，對日本的「巨大貢獻之一」。

而當年他親自拍攝的全套《滿文老檔》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滿學界和國際滿學界最為重要的文獻資料寶庫，更是日本滿學界人才輩出的物質基礎。

（三）漢學家和史學大師時代的內藤

終於，到了一九〇七年，他在狩野直喜等人的推薦下，成了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學部新設立的東洋史講座的第一任教師（講師職稱）。

一九〇九年九月，內藤湖南晉升為教授。第二年，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經過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校長的特別推薦，被授予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桑原先生參與了對

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審查。從此以後，他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座教授的學術生涯。正是在他任上的二十年中，以他為核心領袖，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作為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被日本學術界稱為「京大の學寶」。

內藤湖南先後出版的主要漢學研究著作有：《清朝衰亡論》、《支那繪史》、《支那史學史》、《支那目錄學》、《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の文化》、《支那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等，後來被結集成十四卷本的《內藤湖南全集》出版。

一九二六年，他正式退休後，在京都府瓶原村恭仁山莊每日以讀書和寫作為業，一邊安度晚年，一邊繼續他的研究和政論生涯。在內藤湖南退休後，他還抱病親自來到當時的偽滿洲國，去出席那裡剛成立的日滿文化協會，並擔任學術顧問。臨死前兩個月，還在家中接見老友、偽滿洲國政府總理鄭孝胥的私人拜訪。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因胃癌逝世。內藤湖南死後，被命名為法然上人。遺骨被葬在京都市左京區法然院內，而遺髮則被葬在家鄉內藤家族歷代墓地。

我在一九九九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的那一年，立刻來到這裡祭祀他。並且寫下了一首七律〈祭祀內藤湖南太老師并序〉（作於一九九九年冬）如下：

是年底，余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來到西京法然院祭祀內藤太老師。回憶先生一代學者鴻儒，貢獻卓著，卻積極投身日本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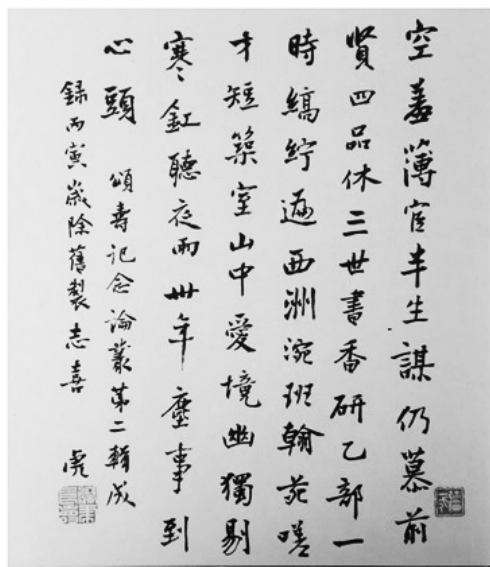
國主義，引起中日兩國正義學者之共討。平心而論，先生是最知華、知史之人！是大宗師！浮想連翩，潸然淚下。成詩一首。

蓋棺花甲勢難休，一代東儒是史首。
唐宋變遷增亮點，文心移動惱神州。
燕山楚水支那論，講學援軍日本羞。
毀譽浮塵如落葉，投胎轉世筆耕牛。

內藤湖南完全是按照中國傳統文人的要求來培養自己。他擅長書法和寫古體詩詞。在他寫的一首七律中，他希望自己是個中國的四品官、最後當個窮書生。七律〈山莊除夕（丙寅 一九二六）〉：

空羞薄宦半生謀，仍慕前賢四品休。
三世書香研乙部，一時縞紵遍西洲。
浣班翰苑嗟才短，築室山中愛境幽。
獨別寒缸聽夜雨，卅年塵事到心頭。

這首詩歌是講：我為了一點殘羹剩飯和微小的職位，努力拚命了大半生，卻一直很羨慕前人的滿足於四品職官的境界追求。想我家



三代都是讀書人，一直在研讀著史部著作，真希望可以做個中國的江南人，去接受文人墨客贈送的白絹腰帶。只可惜自己才疏學淺，會玷污了那些真正在翰林苑的讀書人，我就只好在幽靜的山林裡，建一處居室，靜靜地度過餘生。每天夜晚聽著下雨聲，去剔除煤油燈中正在燃燒的油擦子，三十幾年風雨人生的往事全都一齊湧上了我的心頭。

我個人出版的研究京都學派的兩部專著《京都學派》和《京都學派漢學史稿》之外，還在另外兩部著作《圖說漢學史》（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和《海外漢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也有專章涉及到了日本漢學和京都學派。

二 內藤史學和中國歷史學界的互動

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一直就有「東大の白鳥，京大の內藤」的說法。又有一種說法直接道出他們各自的治學特點和學風區別：「文獻學派の白鳥庫吉，實証學派の內藤湖南」。所謂「實証學派の內藤湖南」乃是對他一生治史風格的概括。

內藤湖南及其開創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術影響是世界性的，也將是跨時代性的，我們在國際學術界中國史的每個方面，幾乎都可以發現內藤史學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影子。

內藤湖南的弟子、著名中國文學史家、京都大學教授小川環樹曾把《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論》四部書列為「內藤史學四大名作」。這一說法是比較有代表性

的。但是，這是日本學者面對日本學術界的觀點。對於國際上整個中國史學界來說，上述四部書並不能概括內藤史學的精髓。以我來看，我把內藤史學分為兩大系列，即：《支那史學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支那繪畫史》，可以稱為「支那古代史系列五書」。而《清朝史通論》、《清朝衰亡論》、《清朝建國史》、《支那論》、《新支那論》可以稱為「清朝史系列五書」。我相信上述兩大系列十部著作，代表了內藤史學的精華。

（一）內藤史學對中國商周歷史研究的影響

王國維的甲骨學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是在和內藤湖南的相互學術交流和啟迪中完善的。見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序文如下：

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胙」，〈帝繫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係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參事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後編》。博士亦採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文藝雜誌》。並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

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秉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乃為此考以復質諸博士及參事，並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

請注意這裡的「博士亦採余說」和「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二句，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內藤湖南還撰寫了〈王亥〉和〈續王亥〉二篇甲骨學考證論文，是在「博士亦採余說」的基礎上才產生的。而毋寧說是內藤湖南的上述論文啟迪了王國維，而王國維在甲骨史料中「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的精湛的考證論文，則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而成的。從內藤湖南首先「博士亦採余說」、利用甲骨史料寫出並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續王亥〉二篇來看，是內藤湖南在王國維的啟發下寫成的，但是他卻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的觀點，注意到了這一重要的史學考證方法的潛在價值，到了王國維史學思想中得到了徹底的運用和成熟。這正是王國維的智慧和學識所在！

正是這一發現，決定性的確定了甲骨文史料的真實性，也證明了《史記·殷本紀》記載的真實性。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這是王國維一個人的重大發現。實際上，我有理由說，內藤參與了這一發現。

而內藤湖南在和羅振玉和王國維兩先生的來往中，特別認識並肯定了他們利用出土

文獻解釋商周兩代歷史的學術方法：「金文和其他文物的相繼出土，逐漸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已經成了最近幾年中國學術界研究的一大傾向。」內藤湖南還特別指出：「今後值得發展的方向已經很明顯就是從對先秦古籍的研究、對金文和殷墟遺物研究的進展而展開的。假如能以這樣的方法建構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話，對於鼓吹支那古典學的人來說，這才是我們要找的所謂科學的、進步的結論。」

而且，羅振玉正是在內藤湖南那裡才獲知了東北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資料，一覽之後，大為驚歎，居然發出了「為平生所未及見」的歎息。辛亥革命後，羅振玉從日本返回天津，作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內藤對他的影響深刻展現出來。他立刻開始了《滿洲金石志》的整編工作。他還在該書出版的序中說：「滿洲古刻石不僅入東方士夫之目，並騰於世界學者之歎。」這裡的「世界學者」當即指內藤湖南。他出版《敦煌石室遺書》則正是在狩野直喜贈送的抄本的基礎上，參照伯希和的照片而成的。正是因為內藤的關注，才引起了羅振玉的積極回應。

（二）內藤史學的中古貴族制說對中國隋唐史研究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學界，因為受史學大師陳寅恪一生專治中古史的影響，內藤史學乃至於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研究專著和學術觀點，一直倍受重視。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就曾和陳垣一起探討當時國際漢學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巴黎，還是在京都的問題。

內藤史學主張：在漢唐盛世時代，貴族制度的昌盛成為制約皇權的一個有效的槓桿。對貴族制度的研究，成為內藤史學乃至於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研究中國中古史的基本立腳點。在貴族制度盛行的時代，皇帝只是貴族制度下的公有財產，和近世中的具有獨裁特徵的皇權有本質上的不一樣。晚唐以後，隨著傳統的貴族制度的衰敗和沒落，政權又重新回歸皇帝手中，獨裁的皇權出現了。

這裡，有必要注意內藤的貴族制是皇家貴族，還是官宦貴族？因為周朝的分封制度到秦漢的封建制度，貴族的皇家貴族是典型特徵。進入隋唐，官宦貴族成為替代。

內藤湖南考查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尤其是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方面，從宋到清保持著一致性，而從漢到唐則表現出相似性。在這兩個時間段之間，則可以看成是下一階段的過渡。於是，他鎖定宋代為中國歷史變化的中樞，以唐宋變革而宋清一體的「近世說」作為內藤史學的立足點，形成了國內外中國歷史學界所熟知的「內藤假說」。

內藤湖南的直系弟子宮崎市定在其名作《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等書中，對宋代到清代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制度、軍事制度進行了詳細地考證和分析研究，調整了以往舊說中的官僚制度和貴族制度之間的矛盾，使「內藤假說」逐漸得到充實和實證。尤其是他對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發現在隋唐時代的選舉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一直潛伏著中世時代所流行的貴族制的主線，而從宋代開始則具有了全新的內涵，這樣一來，他通過對科舉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

貴族制形式的變化和延續。從此，中世貴族制度、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成為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最為典型的學術標誌和研究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座標系。

另一位傑出的著名弟子是岡崎文夫，他的《支那史概說》、《魏晉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三部專著，成了以貴族制度為核心、貫徹和論證「內藤假說」的傑出代表作。岡崎文夫在該書中，繼承了內藤湖南所主張的貴族勢力和軍事勢力的結合，成為這一時期的權力中樞的觀點。中央皇權和地方豪族／貴族之間的對立，儘管他們同屬於統治集團，但是他們的矛盾比一般民眾與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在地域特徵上，北方的皇權集中和南方的貴族勢力形成不可調和的對立關係。但是，他把貴族制度的存在推進到貴族制度國家化的程度，並且經過考證，認為隋唐貴族制度起源於漢代的鄉舉里選制度，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師的格外贊許，內藤湖南甚至認為他自己對中世貴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書中，已經接近完成。

內藤湖南「隋唐貴族制」和「宋代近世說」的出現，最大限度啟發了對隋唐政治制度的研究。他考察了唐宋兩朝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和文學藝術等方面表現出來的種種差異和變異，特別著眼於隋唐貴族制度的崩潰和宋代君主獨裁政治的出現，以及他所謂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乃至於貨幣制度的通行、文藝風格的變遷等。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使學者們充分注意到了宋代及其後代的制度延續，特別使發生在唐宋之際的制度變革，在古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逐漸擴大到了中原以外的邊遠地區，並且又反過來影響到中原地區的主體制度。

大家一定記得陳寅恪曾經以「新宋學的建立」或「宋代學術的復興」作為未來中國文化的支點。在陳寅恪那裡，唐、宋明顯地是被分開的，他的隋唐一體和對宋代學術的寄託，他的以「種族文化論」來部分代替對內藤史學中「貴族論」的主張，他在分析牛李黨爭時的山東士族和新興階層的矛盾，本質上和內藤的隋唐貴族制度的假說沒有太大的區別。他說：「寅恪嘗於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詳論北朝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文化，而不在種族。茲論南朝民族問題，猶斯旨也。」陳寅恪重申「種族與文化」是「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這裡的「文化」其實就是「貴族文化」的簡稱，陳氏故意省略了「貴族」二字。而內藤史學的核心也正是隋唐貴族制度及其文化表現。

甚至陳氏主張未來中國文化是「新宋學的建立」或「宋代學術的復興」，都可以看出陳寅恪對內藤假說的贊同和發展。陳寅恪的隋唐史研究則是發展和推進了內藤史學關於中古史貴族制度的學說。而經過陳氏弟子的深入傳播和研究，今天已經成了隋唐史研究的基礎之一。

結合剛才我們的提醒：內藤的貴族制是皇家貴族，還是官宦貴族？因為周朝的分封制度到秦漢的封建制度，貴族制的皇家貴族是典型特徵。進入隋唐，官宦貴族成為替代。如果宋代開始，新興地主階層的出現，到明清鄉紳勢力的大量普及，我們是否看作是貴族制度的地方化和鄉村化？誠如是，內藤假說應該還有繼續存在的價值。

但是，如此高度肯定宋代的陳氏，卻沒有想到：

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就等於把由宋到清的歷史進程等同為一個早熟，而且高度發達的封建王朝走向長期衰老的漫長歷史過程。在他看來，固有的中國文化中心已經是一個衰弱的老人，而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後，並獲得新興的日本文化，則是一個健康生長的青年。這類觀點在內藤史學中，表現得還是很突出的。特別是在《支那論》和《新支那論》二書中，那裡面十分強烈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和觀點，為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有意無意之間，卻直接提供了文化注解，這成為內藤史學及其本人遭人詬病的直接證據和原因。就連他的再傳弟子也公開承認：「湖南在《支那論》和《新支那論》中，都暗示了在一定條件下中國有國際管理的可能性。他的這一觀點與日本經濟輸入意見，給人留下了是否具有將侵略中國正當化企圖的疑問。」一旦喪失了工具理性，無論他是多麼優秀的史學大師，也難免成為軍國主義政治的文化傳聲筒。博學而不世出的內藤湖南將其傑出的史學理論，拱手送給了日本軍國主義政府。

今天，雖然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等領域，中國學術界早已經出現了唐、宋的分離性研究局面，而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唐宋一體和唐宋分離卻是以一種微妙的連接存在著。

（三）內藤史學對中國敦煌學研究的影響

敦煌學在中國歷史學界的出現和發展，更是內藤史學的貢獻所在和對中國歷史學界的巨大影響所在。在中國歷史學界一直有人主張陳寅恪是敦煌學的開創者。

其實，真正的敦煌學的開創者應該是內藤湖南。

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東京和大阪兩地的《朝日新聞》，內藤湖南以〈敦煌石室的發見物〉為題，報導了敦煌文獻的發現。接下來的幾天中，他撰寫的長篇報導〈敦煌發見之古書〉陸續發表。一九一〇年八月，京都帝國大學立即派遣內藤湖南與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和富岡謙藏五人來京，調查保存在學部的敦煌文書。然後的幾年中，無論從敦煌史料的搜集、整理、使用和規範，還是從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和文獻對比考證等方面來說，內藤湖南奠定了敦煌學的各個研究模式和研究基礎。

高田時雄在〈內藤湖南の敦煌學〉一文中，特別肯定了在早期敦煌學研究各個方面內藤湖南的巨大貢獻。內藤一直以「支那古文書學」來指代敦煌學。內藤最早參與了對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獻的收集和調查、親自拍攝了上千張的敦煌文獻照片，並加以分類和考證，至今留下了幾十本的研究筆記。他將文字考證、版本考證和當時的歷史結合起來，並對敦煌文獻給予精準分類，為敦煌考古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至今也影響著中國歷史學界和敦煌學界。隨著最近幾十年對海外漢學研究的注重，有關內藤湖南的著作和研究論著開始大量出現在中國學術界，甚至出現了以研究內藤湖南的思想為核心的博士論文。把內藤湖南的貴族制理論和陳寅恪先生的種族文化論，進行學術思想的對比性研究，已經成為可能。

（四）內藤史學對中國歷史學界章學誠研究、清史研究的影響

一九二〇年，當內藤湖南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一文在《支那學》刊物上剛一發表，胡適看到後，引起了極度的關注，立刻致函內藤湖南，和他展開了學術交流。

內藤湖南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學大師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一書的史學思想和學術貢獻，是特別值得讚許的地方。因為作為日本學者的他，遠比中國學者更早期、更全面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

內藤湖南在《支那史學史》一書中，對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非常推崇，也肯定了胡適等人對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該書〈章學誠の史學〉一章中，他首先闡述了自己發現章氏學說的過程：「自己第一次讀此人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是在明治三十三年，那時覺得非常有趣……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讀之後，做了這個人的年譜加以發表。」而據貝塚茂樹的回憶：「內藤先生對我說，章學誠這個人，在西方來說，像是社會學，他的帶有社會學性質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會學啊。是斯賓塞等那一類型的東西啊。」作為記者出身的內藤，永遠關注的是社會學及其社會表現形式！

內藤湖南最為賞識的是章氏的六經皆史說、原道說和原學說等觀點，這些觀點深得內藤湖南的贊賞。在《支那史學史》中，內藤湖南還特別肯定了章學誠創建方志學的學術史意義，在介紹這一新學說時，他不惜點出了戴震對方志學的非難，這顯然已經暗含著對戴震的批評。這本《支那史學史》現在

的漢語譯本，一直是大陸和臺灣學術界和讀書界的熱門著作。

在內藤湖南和胡適的往來書信中，特別多的內容涉及到了對章學誠的研究。可以說，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就是在內藤湖南的〈章實齋年譜〉基礎上的登峰之作。而內藤湖南在讀了胡適所寫的年譜之後，立刻發表了〈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一文，並訂正了胡適文中的十五處錯誤和不準確之處。胡適則虛心接受，並來信表示感謝。

另外，內藤對清代美術史、清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是大陸和臺灣清史研究的開路先鋒。他的《清朝史通論》、《清朝衰亡論》、《清朝建國史》、《支那論》、《新支那論》重要觀點和寫作模式、關懷核心，幾乎一直就是大陸和臺灣兩地清史學者的研究和模仿的核心！從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到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新清史」系列，都可以找到內藤史學的影響。最近，在中國和日本的博士生、碩士生中，已經有專人進行這一比較研究。

（五）特殊影響：內藤史學的文化中心移動說成了中國歷史學界的禁區

內藤湖南認為：古代的中國文化在其特定的時代和地域內，形成了所謂的「文化中心」。而具體到每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都會因為地理環境和時間的關係的不同，產生一個凝聚當時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這個文化中心形成之後，就開始了它的不停地發展變化和向前移動的歷史過程。即以中國古代王朝發展的歷史而言，從洛陽到長安，

再到燕京，最後形成了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心。由此而來就形成了宋代以後中國的「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現實問題和政治勢力圈。

其實，到此為止，內藤湖南的觀點還是比較正常而且理性的。這一觀點的異常是從下面開始的，即：他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時還會越出漢民族、中原，甚至中國本土的範圍，形成一個他所謂的「東洋文化圈」。換而言之，他主張：中國文化的中心下一步將要移動至日本，由日本來振興中國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天職」。在《支那論》一書的〈所謂日本國の天職〉一文中，他則公開地主張：「日本的天職，不是介紹西洋文明，把它傳給中國，使它在東亞弘揚的天職。也不是保護中國的舊物賣給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風尚風靡天下、光被坤輿的天職。」這是最早出現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來源。

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主張：中國文化由內向外不斷地擴大發展的總趨勢，使周邊地區的落後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區先進文化的影響後，繼續向四周擴散一樣、並且和當地固有的文化傳統完成整合。他提出了「中日文化同一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國文化中心的延長點和未來中心所在地。在闡述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時，他又提出了中國文化的「鹽鹵比喻」和「波動比喻」。即：日本文化就像是一碗豆漿，而中國文化則是使它集聚成豆腐的鹽鹵。而中國文化的發展是波動性質的，從內向外的發展就像波紋一樣，而遇到任何阻礙都會自動反射回去，然後再以新的波紋向外發展，形成

了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越到後來，波動的中心就越衰老和虛弱。

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其起源上，則是和清代乾嘉學者的地理學思想、尤其是和趙翼的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趙翼史學中的經世致用學說和氣運地氣說，在內藤史學中被發揮到了極至。不了解這一點，也就無法把握內藤史學，乃至於解釋內藤湖南的以學論政的一生。趙翼在〈長安地氣〉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中國古代都城自西向東遷移的原因，是「氣運」演化的結果。而這一點則深深地打動了內藤湖南，並引以為知音。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提出的「讀史以觀世變」的思想，幾乎就是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的立論依據。從此以後，精通趙翼的史學思想成了他的弟子們的看法法寶之一。內藤湖南由趙翼的「氣運」的移動說聯想到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多次出現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東西的移動現象，由此而來，終於創建了他自己獨特的「文化中心移動說」。

這一理論至今是中國歷史學界的研究禁區之一，以至於對趙翼思想的研究，也受到了制約。

內藤湖南在當記者時代，曾經對中國的現實進行過很準確的預言和很精細的觀察。比如他對清朝滅亡的預言，比如他對滿清腐敗和舊北京大小生活細節的觀察等等，這反映了作為記者的內藤湖南敏銳的觀察力和政治預見能力。但是，當他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以後，他對現實的預言逐漸被學術史的考證和嚴謹的治學風氣所代替。顯然，作為

學者的他，已經日益占據了他對現實的關心。但是，很快，隨著日本占領東北和滿洲國的成立，他對政治的關心又重新得到了發揮。他可以說一直在履行著經世致用的趙翼史學思想。

儘管在戰後，內藤湖南所建構的內藤史學，因為其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遭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學理論家們的尖銳批評，但是，在遠離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後，內藤史學作為京都學派的核心組成，還是得到了國內外的中國歷史學界的高度肯定和深入研究。

最後，我希望大家多關注一下桑原先生及其桑原史學。

感謝哈佛大學給我這一機會。哈佛大學不但收藏了我個人的八部學術著作，還收藏了我高祖的四部學術著作！這讓我倍感親切和感激！感謝今天各位教授和學生、學者們的積極參與和指教。如有任何指教，請來信給我：kyotosizumoto@hotmail.com

校對：黃玉雯／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學生

江歆茹／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學生